



湖北经济学院学术文库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 媚俗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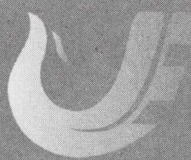
ZhongGuo JinXianDai TongSu WenXue
De MeiSuHua YanJiu

金立群◎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经济学院学术文库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 媚俗化研究

ZhongGuo JinXianDai TongSu WenXue
De MeiSuHua YanJiu

金立群◎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媚俗化研究/金立群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8

ISBN 978 - 7 - 216 - 05201 - 6

I. 中…

II. 金…

III. ①近代文学:通俗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②现代文学:通俗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6589 号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媚俗化研究

金立群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鄂州市立龙印刷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2.375

字数:220 千字

插页:1

版次: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201 - 6

定价:26.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摘 要

本文的逻辑基点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不仅应理解为包括了审美与启蒙、革命与欲望这样终极目标价值的总体性现代性，而且还应包括“诉诸感官”的、无意识的、零碎的、平面化的非总体性现代性。

“绪论”揭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存在着两种文化转型和两种现代性。一种文化转型遵循启蒙式的由观念到观念的观念改造路径，对应着包含着终极目标与价值的总体性现代性；另一种文化转型则遵循直接由物质到观念的感官刺激的路径，对应着非总体性的现代性，也即“现代性的碎片”。而后者在文学艺术上的表现就是媚俗，这正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特质。

第一章“文学的位移和媚俗的发生”，首先揭示了在19世纪末近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出版物变得大量而廉价，从而使阅读行为成为更广泛的人群，特别是在一般市民的日常消遣的过程中，由于媒介的变迁，导致了文学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变化。文学作品不再是单独的存在。它已作为某一更大的文化商品的一部分被提供给读者。而媒介在这里的作用就是如何拼盘、打包，从而把这一商品售出。单个文本已不再具有崇高地位，它开始沦为整体商品中的零件。因此，对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研究，实际上就成为期刊视野下的综合性的文化研究，因为文学在这里是和其他文字一起，作为一件不可分割的文化商品整体被提供给读者的。而媚俗的发生则源于文化、文学的商品化和大量复制。具体于中国来说，由晚清大众报纸、石印画报、小报之图像、文字所构筑的都市印象与现代体验标志了媚俗的发生。本章重点以《申报》和《点石斋画报》为例，对这一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并以《申报》和《苏报》的对比，比较了媚俗文化世界与总体性现代性的文化世界之间的区别。

第二章“包装的手段：媚俗化中的文学期刊编排策略”则基于这样的逻辑：由于在媚俗文化的世界里，读者所接受的，首先不是哪篇具体的作品，而是一件整体的文化商品，这件文化商品首先要通过一种感官层面的视觉效果激起读者的消费欲望，通过期刊体式、目录、由摄影和图画组成的彩页这些读者必然在第一时间浏览的内容传达出整个商品的大致口味和消费价值，因此本章就从杂志的栏目、图文安排方面入手，探讨作为消费品的通俗文学杂志是如何包装成型的。本章首先描述了近现代通俗杂志编排体制上的流变过程，说明了栏目编排与形制对于形成媚俗化的阅读世界的重要作用，接着又在区分图像之认识功能和感官功能

的基础上探讨了视觉图像在通俗杂志中的媚俗化运用,并重点分析了《良友》画报。本章还指出了由于整个社会文化消费中感官化程度的不断增长、强化,20世纪二三十年后出现了新兴视听媒介对传统印刷媒介的冲击。

自第三章开始,该书分别从知识系统、审美系统、价值与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这样三个方面全面探讨了以通俗杂志为代表的媚俗文化世界的整体风貌。这种描述方式正符合这些杂志作为文化商品整体给读者带来的不可分割的整体阅读效果,避免了通常的作家作品流派的叙述模式由于需要建构某种话语秩序而对丰富的历史原生态可能进行的简化。

第三章“俗套与时尚:媚俗化中的知识系统”论述了通俗杂志所包含的知识系统的建构途径和更新方式,将这一知识系统和新文化知识系统进行了对比,说明其有别于系统性、继承性和逻辑性的知识体系,表现出杂、浅、平面化的特征。媚俗化知识系统的来源是生活表象的幕前幕后,其内容的变迁则有赖于俗套与时尚间的相反相成和交替更新。本章还对这一知识系统的内容进行了大致扫描,并揭示出通俗杂志、通俗文化和当代都市生活之间的同构关系。

第四章“拼贴与嵌入:媚俗化中的审美系统”论述了通俗杂志、媚俗文化中的美正是现代都市所呈现出的感官的美、装饰的美、浅层次的美。不论在杂志编排的层面,还是在具体的一篇通俗小说的层面,拼贴与嵌入都是这一审美系统的基本美学原则。本章对实现这一美学原则的各种技巧手段进行了全面揭示,论述了这一美学原则给读者带来的审美效果:它使整个的媚俗文化在不断的复制中又表现出某种新鲜,从而形成了自身美学上的魅力。通俗杂志、媚俗文化中的美是被制造而非创造出来的美,是标准化的文化生产过程的结果,正是由于这种拼贴技术,消费文化市场上的新旧更替和大规模制作才可能并行不悖。

第五章“没有主义:媚俗化中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存在方式”论述了通俗杂志、媚俗文化中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组合方式与表达方式。在这个文化世界中,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以杂烩的、混乱的、随意的方式被组合在一起;它们不复是深度的价值意义系统,而被改造为平面化的面具和标签,其功能也由阐释变成了装饰。正因为此,各种异质的思想、价值才可能并置于一处,而彼此间没有任何话语的冲突;它们也因此失去了应有的教育、组织和动员效用。尽管这一文化世界中包含了各种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但其中却没有任何主义话语的存在。

在这些章节的描述与分析中,始终贯穿了比较意识,随时地将以通俗杂志为代表的媚俗文化世界和古典型文化世界、新文学新文化的世界进行比较,从而说明了,尽管它看上去是“附庸”式的存在,却有着自己独立的显现与组成逻辑,发挥着完全不同的功能。它悄悄改变了读者们潜意识层面的文化心理结构,改变了读者眼里世界的存在方式,从而为奠定中国通过现代转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长时程所必须的长期稳定的根基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目 录

绪论:何谓现代性的媚俗化	1
一、两种文化转型与两种现代性	1
二、“两个翅膀论”与媚俗化问题的引出	8
三、媚俗化·通俗化·大众化	16
第一章 文学的位移和媚俗的发生	24
第一节 文学的位移:由作品到商品	24
一、文学的传统存在方式:以作家作品为中心	24
二、近代以来文学数量的膨胀和媒介作品关系的变化	25
三、媒介的商品化与文学的商品化	27
四、文学研究中期刊视野的意义	32
第二节 媚俗的发生——从“新瓶装旧酒”开始	33
一、以早期《申报》为例:一个最初的媚俗化世界	33
二、《申报》与《苏报》:媚俗与非媚俗的比较	39
三、关于“新瓶装旧酒”的问题	43
第二章 包装的手段:媚俗化中的文学期刊编排策略	47
第一节 栏目编排中的媚俗化表现	47
一、“栏目”的出现与意义	47
二、从大型化到小型化:以《礼拜六》为转折点	49
三、小型化后的精致化:从《红玫瑰》《紫罗兰》(前)到《永安月刊》 《万象》	54
四、两类不同的杂志形态:两个阅读世界的简单对比	61
第二节 视觉图像的媚俗化应用	63
一、视觉图像的不同功能	63
二、绣像时代的图文并茂	64
三、摄影时代图画栏的全面兴盛	67
四、以《良友》为代表:摄影画报的异军突起	70
五、新兴视听媒介对传统印刷媒介的冲击	75
第三章 俗套与时尚:媚俗化中的知识系统	78
第一节 媚俗化知识系统的建构	78

一、媚俗文化与新文化:两种不同的知识系统	78
二、媚俗化知识系统的材料来源:生活表象的幕前幕后	85
第二节 媚俗化知识系统的更新	93
一、俗套与时尚的相反相成	93
二、俗套与时尚的交替更新	97
第三节 媚俗化知识系统扫描	102
一、文史掌故:媚雅和媚俗	102
二、科学常识:科学的碎片	104
三、世界见闻:“西方”是个万花筒	106
四、时尚生活:“现代”剪影之一	108
五、职场生存:“现代”剪影之二	112
六、情场百态:怎样操作爱情	115
七、小结	119
第四章 拼贴与嵌入:媚俗化中的审美系统	122
第一节 杂志编排中的审美意识	123
一、基本编排技巧:风格、口味的穿插交错	123
二、编排技巧背后的美学意味:拼贴与嵌入	127
第二节 通俗小说中的拼贴与嵌入	131
一、新旧混杂	131
二、功能拼贴	135
三、热点嵌入	139
四、拼贴技巧的日益娴熟	142
第三节 拼贴与嵌入:被制造出来的美	146
第五章 没有主义:媚俗化中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存在方式	150
第一节 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组合方式	150
一、西方学术界与中国学术界的媚俗文化意识形态观	150
二、无可无不可: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大杂烩	155
第二节 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	160
一、媚俗化中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几种言说方式	160
二、没有主义:媚俗文化的反阐释性	167
结 语	175
参考文献	184
致 谢	193

绪论：何谓现代性的媚俗化

一、两种文化转型与两种现代性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封闭，也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正是在这个时候，魏源写出了可称中国人看世界的第一本著作《海国图志》。他希望这本书能够开拓人们的视野，使中国不自外于世界。然而讽刺性的是，这本在一般近代史叙述中被抬到很高位置的著作，在它问世后的半个世纪里，读者寥寥，根本没有对中国其后的文化社会变迁产生多大的影响。倒是在日本，它被多次再版，成为影响日本维新的重要著作。但无论如何，在历史叙述中，它的出现是被视为中国现代化之第一步的重要标志的。鸦片战争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租界的出现。1845年11月，上海的第一块英租界划定。但开始时的租界实际上只类似于外国人居住并从事商务活动的隔离区，租界内除了为之服务的少数华人外，再无普通的中国居民。直到1854年，在现实的商业利益面前，中外相关当局才取消了华洋分居的有关章程。而中外杂处的结果就是“上海自开埠通商以来，地方风气为之一变”，^①所谓“申江好，马路说洋场，万户千门皆孔道，四通八达尽康庄……申江好，地火最光明，漏转铜龙夸不夜，花开铁树照深更……申江好，电线疾雷霆，万里语言同面晤，重洋信息霎时听……”^②以至于时人会有这样的观感：“由同治视嘉庆时，其见闻异矣。由今日视同治时，其见闻尤异矣。更阅数十年，人心风俗之变幻必且倍甚于今日。”^③由此可见，如今已被经典化的《海国图志》在当时实际上并没有打开几个人的视野，倒是华洋杂处后租界里不断出现的新风物移了一地之风。作为现代观念标志之一的时间意识正是在这诉诸感官的今昔对比中获得的。

“诉诸感官”对人的观念改变究竟能有多大呢？我们还可以再来看一个更具

① 王钟撰，胡人凤续辑：《法华乡志》，转引自熊月之、张敏著：《上海通史 第6卷：晚清文化》，第3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沪垣杂咏》卷8，转引自唐振常、沈恒春主编：《上海史研究》二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

③ 吴馨等修，姚文楠等纂：《上海县续志》，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第3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体的例子。1872年—1876年，上海的英美商人出资修建了中国第1条近代铁路，也就是吴淞铁路。过去我们从一般历史叙述中得到的印象是，由于中国老百姓和官僚愚昧地认为铁路会破坏风水，惊扰祖坟，并担心影响从事航运者的生计，因此纷纷反对，以致于最后朝廷花了20多万两白银买下了这条铁路，并予以拆除。而且自1880年起，为是否应修建铁路的问题，士大夫统治集团中也曾有过三次重大争论。^①然而事实的另一面却是铁路在它短暂的1年运行时间里受到了热烈欢迎。通车的头两个月，即1876年7、8两月，乘客共16894人，而到当年12月，乘客即超出7、8两月总和，达17527人，以至于不敷座位而必须增加车辆。到了铁路停运的1877年8月，乘客已超过16万人次。^②这些乘客当中，绝大多数是华人，甚至有人从江浙一带慕名而来。看铁路简直成了一个旅游项目，成为上海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即城内终年几不出门外半步者，闻有此事，亦必携家眷，一游铁路”。^③到了铁路被收回停开的时候，一般舆论都表示了惋惜，观念明显转变：“从前未见火车，亦均不知火车好处，今已行有数月，往来吴淞者均称其便，一旦停歇，殊令人皆往来不便。”^④在这场有关铁路的风波中，铁路本身当然不会说话，也不会著书，也没有看见其中有什么著名的讲求科学破除迷信或曰铁路有利于国计民生之类的名篇大论流传下来。而人们观念的改变全在于亲眼目睹，亲身一试。结果由于铁路切合了人们追求方便、舒适的本能要求，虽然它终于被拆毁，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对铁路的抵触不是就在这追求新奇、渴望方便的本能欲望中无形消遁、弱化了吗？而这一观念的转变，显然是循着有别于思想启蒙的另一途径。

让我们再来更具体地看看女性观念的变化。在有关女性之由传统步入现代的历史叙述中，我们有一个最熟悉的典型，就是秋瑾。她打破无爱的婚姻，从家庭走向社会，着男装，挎刀喝酒，打破了传统的女性规范，可称得上是中国女权的先驱。然而，比秋瑾更早，还有另一类女性的转变：“乡间妇女至沪佣工，当其初至时，或在城内（即华界——笔者注）帮佣，尚不失本来面目。略过数月，或迁出城外（即租界——笔者注），则无不心思骤变矣。妆风雅，爱打扮，渐而时出吃茶，因而寻姘头，租房子，上台基，无所不为，回思昔日在乡之情，竟有判若两人者。”^⑤秋瑾的转变是受了有关女子也应承担和男子同样责任的启蒙思

① 参见吴士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通鉴 洋务运动与边疆危机》，第二篇之“围绕修筑铁路的三次大争论”一节，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参见唐振常、沈恒春主编：《上海史研究》二编。

③ 《记华客初乘火车情形》，《申报》1876年7月3日。

④ 《论铁路火车事》，《申报》1877年10月26日。

⑤ 《论男女无耻》，《申报》1879年9月21日。

想的影响。而那些“乡间妇女”的转变则是“诉诸感官”。这里的“感官”，当然不仅仅对应着诸如电灯、马路、铁路之类的新鲜事物，它还对应着具体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就拿最核心之一的封建意识“男女大防”来说吧，到1899年，仅在上海租界做工之女工就达到2万人，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工作场合还是日常交往，所谓男女授受不亲等两性关系方面的禁忌均无形地松动。至于一般的抛头露面，早已不在话下。当时的竹枝词就有描写女工散工回家成群结队走在马路上的情景：“或是缣丝或纺纱，斜阳工散各回家。手提饭搥梳妆奁，七八娇娃一小车。”^①而普通女子出入茶楼烟馆等一般消闲场所，在19世纪末的上海，更非鲜见。进城妇女弃夫另找情人之事亦较普遍，当时流行的所谓“台基”，类似于今天宾馆的“钟点房”，就是专为了男女幽会的需要而设。即便当时的一般舆论仍视此为伤风败俗，但“每见上海社会中发现一伤风败俗之事，一段舆论则必曰：此幸在上海耳，若在内地，即使幸逃法网，亦不免为社会所不齿”^②亦说明了社会的宽松。若将此和几十年后“五四”时代冯沅君小说里“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引起搭客们的注意”这样的描写相比，我们一定会对历史的进化感到怀疑。和乡间那些传统妇女相比，无论这些“上海女人”的行为怎样难登大雅之堂，应该说，她们相对而言也是不同于传统女性的现代女性，同样在进行着自己的观念转型。

近年来，在西方语言学本体论的影响下，我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即视语言的变革、现代汉语的构建为整个文化、思想、观念变革的基础，而非仅仅是变革的形式。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有关晚清到“五四”时的种种翻译实践和理论、国语运动、白话文的欧化问题等等都受到了高度重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比较清楚地从现有的学术界研究成果中理出一条语言翻译、变革的线索，来说明西方观念和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由此促成的中国的文化转型。林纾、严复、鲁迅、胡适等都是这条线索中的巨人。然而，还有另一脉语言的变革，至少为上海的数十万人、上百万人使用，并不断辐射周边地区，而成为一般人炫耀自己“拎得清”的资本，这便是“洋泾浜”：所谓上海“这特区之所以能存在于世间，就根据那几条洋泾浜章程”，^③所谓“外国人和当地中国佬之间所进行巨额贸易的十分之九，都是通过这一古里古怪的‘洋泾浜英语’去完成的，离了它，您还真

① 转引自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第41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姚公鹤：《上海闲话》，103～1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③ 汪仲贤撰述，许晓霞绘图：《上海俗语图说》，第1页，上海书店1999年影印。

是玩不转”^①，都说明了它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尽管从严格的学理意义上讲，“洋泾浜”首先是外国人创造的简化外语，为便于和当地人打交道，发源于广东，但它最终繁荣于开埠后的上海，而由一种纯粹商业交际的工具扩展为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实际演变为欧化的上海白。不论从实际的商业交际功能上，还是从作为上海人的自我认同上，能不能说几句“洋泾浜”，几乎成为一个有见识的上海人的标志。也正因为如此，诸如“来是‘康姆’去是‘谷’，廿四铜钿‘吞得福’，是叫‘也司’勿叫‘拿’，如此如此‘沙咸鱼沙’so and so，……洋行买办‘江摆渡’，小火轮叫‘司汀巴’，‘翘梯翘梯’请吃茶，‘雪堂雪堂’请依坐”^②之类的洋泾浜歌诀才会大行其道。然而，尽管“洋泾浜”如此流行，它却“没有严格的语音和语法规则，没有固定的词汇库，没有固定的书面形式。它被当地人广泛使用，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却没有人会将其作为母语，出生伊始就开始学习。”^③一言以蔽之，和以林纾、严复、鲁迅、胡适等为象征的，由各自负载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东西方语言体系之间形成的交流、转换与耦合相比，“洋泾浜”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反体系性，是它的即时性、随意性和片面性。它不是严格的语言翻译和转换，而同样是利用听觉相似的“诉诸感官”的产物。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西风东渐下一般上海市民观念变革的语言承担者，恰恰就是这种一鳞半爪、东拼西凑的“半吊子”语言。即便后来上海出现并长期保持了“英语热”，正规的英语人才大量增加，正规的翻译与文化引进已成气候，甚至于诸如永安公司这样的大百货公司招考营业员都要求应聘者能进行英语会话，但“洋泾浜”却在最广大的市民中一直流行到1949年，为“英语热”以及翻译家、文化巨人们的工作能取得成效创造了宽松开放的文化氛围。

论及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学术界通常的叙述方式是将其按时间的先后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着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样三个不同的层面，并且，“从器物、制度到精神，全面而深入。”^④在这种进化论的叙述方式下，不仅时间成为表征进化的维度，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这种由表及里的不同层面也有了价值的高下之分。相应的，作为精神文化代言人与思想启蒙承担者的知识精英也被描述为这场文化转型的主要承担者：“在中国，知识阶层是现代化的鼓吹和发动者，历次革命与变革都是由知识阶层中的精英集团倡导的”、“从

① [美]何天爵著，鞠方安译：《真正的中国佬：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第5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汪仲贤撰述，许晓霞绘图：《上海俗语图说》，第2页。

③ 参见祁文英：《语言混血儿——洋泾浜英语》，《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外国语言文学专辑”。

④ 熊月之：《上海租界与文化融合》，马长林主编：《租界里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启动现代化的动力群体来看，西欧属于资产阶级主导型，日本属于政府官员主导型，……中国则可称之为知识分子主导型。”^①同时，对于文化转型的发生，则一般将其归为“危机意识”，以应对“总体性的民族生存危机”为文化转型围绕的“基本主题”。^②这样一种文化转型的描述，是连接着民族国家层面的宏大历史叙事。于是一系列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之类的“精英”乃至“卡里斯玛”式的人物就成了这场文化转型的主角；从同文馆、留美幼童到大规模的留学潮，从重要西方典籍的翻译介绍到重要的思想文化运动就成为这场文化转型的主要内容。

我并不打算否认这样的叙述方式以及由此展现出来的历史。但是它不等于历史的全部。当开明的知识分子与保守官僚们还在为吴淞铁路的保留与否争论不已的时候，尝到甜头的老百姓其实已经接受了这个新事物，而淡忘了对破坏风水的恐惧；当秋瑾还在呼唤着女界觉醒的时候，上海的女工其实早就实现了自己经济和感情的独立；当1920年前后的新文学界为语体文的欧化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更加不伦不类的语言杂烩“洋泾浜”已经流行了半个世纪，而且没有惹出任何抵触质疑的风波。当然，我们不能说后者的精神境界就达到了前者的高度或深度，上海的女工当然不如秋瑾有明确的自觉意识和深厚的思想底蕴，“洋泾浜”不成体系的简单语义“系统”与文化负载也不能和语体文相提并论。但后者又确实体现出一般普通人所能在日常生活中触摸得到的具体的文化转型，而将更多的普通人带入到一种现代的日常生活之中。它似乎缺乏明显的范式和体系，其承担主体是一般的市民，其发生的动力是源于新鲜生活表象的刺激，而远离民族国家层面的危机意识；它超越了一般的器物、制度、精神文化的高下分野，始终和日常生活所展现出的种种新鲜的物质文明与社会现状紧密相连；它不是循着启蒙式的由（启蒙者的先进）观念到（启蒙对象的落后）观念的观念改造路径，而是沿着直接由物质到观念的感官刺激的路径。

正是由这样一种“诉诸感官”的文化转型方式，我们似乎已经可以把握到一种不同的现代性。现代性是一个最难以说清的名词，之所以难以说清就在于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联系着复杂变动的现代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被众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超高密度地言说着。我在这里不打算先用一系列的“韦伯说”、“吉登斯认为”、“哈贝马斯指出”之类的语录体为自己穿上一层保护服。我们所熟知的对现代性的分析，不论是有关现代性的不同向度，亦或启蒙/审美现代性，或者将现代性视为区别于传统而又向未来延伸的开放系统，侧

①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 第1卷（1800—1949）》，第20、2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②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 第1卷（1800—1949）》，第9页。

重的都是总体性的观照。这样的总体性或体现为总体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或体现为总体的精神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新型传统，而以总体性的价值目标为核心（当然这种核心不一定是单质的，而可能是包含对立因素的相互作用，如启蒙功利与审美反思）。但由“诉诸感官”所形成的现代性却无法从社会制度总体或精神思想总体去衡量，它体现于“永恒的现代社会生活的形形色色的‘瞬间图像’或者说是‘快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琐碎的表面现象”，^①它连接着普通人对这个时代巨变的种种瞬间的、不连续的、片段的感受和体验。相对于现代化的总体性目标、意识而言，它是无意识的、零碎的、平面化的。德国思想家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在他分析大众装饰的文章中甚至这样声称：“一个时代在历史中占据的位置，更多地是通过分析它的琐碎的表面现象而确定的，而不是取决于该时代对自身的判断。”^②这话确有几分道理。当1917年10月当时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先施公司开业的时候，它给人以这样的全新观感：“在此以前，南京路上原有很多大商店，但都是专业性的，一家商店只供应一类货品，如南货店、绸缎店、银楼、西服店、时装店、鞋帽店、酒菜馆、食品店等，如果要买几种商品，就得跑几家商店。自从先施公司一开张，只要踏进它的大门，衣着、日用品、吃、喝、玩、乐统统齐备，而且品种花色多，价格贵的和便宜的都有。”^③而如果拿这样的观感和蔡元培先生在同时期主持北京大学所持的“我对于各家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④之宗旨相比，我们不应忽视，一家百货公司的开业同样促成了一种现代的多元观念。而尤其特别的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多元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是在多元消费的事实面前“不知不觉”建立起来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通过“多元”消费，也许比通过“多元”思想更能建立起他们的多元观念。

不少西方社会学家与思想家在关注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以及相关的现代性问题时，就已经注意到了这种不同于总体性叙事的现代性层面。而他们的研究方法，则是从一般人看来“最表面，最不实在的东西”出发，去探询社会现代转型的痕迹。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包括本雅明、克拉考尔、齐美尔等人。例如齐美尔就深信，研究“人们相互打量的方式，连同他们互相写信、共进午餐、相互同情或者敌视、为他人穿衣打扮这些事实……研究这些互动，比研究社会的

① [英]戴维·弗里斯比著，卢辉临、周怡、李林艳译：《现代性的碎片》，第11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② [英]戴维·弗里斯比著，卢辉临、周怡、李林艳译：《现代性的碎片》，第11页。

③ 姜豪：《上海先施公司》，《上海地方史料（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④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

主要结构和制度，能产生对社会的‘更深刻更准确’的理解。”^①而克拉考尔、本雅明等分别以大众装饰和电影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都显示出了他们观察社会生活、体验社会现实的崭新方式。英国学者戴维·弗里斯比指出：“他们的现代性探询都具备了哈贝玛斯指出的无所不包的现代化理论著作所缺乏的东西，即关注、重视日常生活中体验现代性的实际方式”，并将这样一个现代性层面命名为“现代性碎片”：“对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而言，这样做不是为了去制造无所不包的抽象的现代性理论，齐美尔的‘现实的偶然性碎片’、克拉考尔的‘无关宏旨的表面现象’以及本雅明的‘辩证意象’或‘单子’，都在日常世界里救赎了最微细、最琐屑的现代性痕迹。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试图去破译现代性碎片的意义。”^②

而在当下，后现代式的文化语境中这种不同于总体性大叙事的现代性尤其引人注目。利奥塔认为，“以前那些由民族国家、党派、职业、机构和历史传统组成的引力极在这一背景中失去了引力”而导致了“大叙事的崩溃”。^③吉登斯对此用“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的范畴加以说明。他将解放政治定义为“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因而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改造态度”以及“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性统治”，“凭借一种权力的等级概念来运作”；而生活政治则是“生活方式的政治”，所对应的权力是“非等级化的”，其关注的重点是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具体问题^④。尽管这些理论阐述所针对的都是“晚期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当下情境，但是也正如利奥塔所说，后现代主义“不是终极处的现代主义，而是初生状态的现代主义”，如今颠覆了大叙事的“现代性碎片”，其实已经飘荡了100多年。

让我们再回到中国的具体历史过程，就会发现，尽管中国的文化转型作为后发外生型存在着诸多特殊之处，对应着民族生存危机的总主题，体现为学界普遍取得共识的若干主要线索（诸如政治功利的、启蒙的、审美自足的、文化守成的），但也同样存在和西方早发内生型的现代化过程相同的共性，即从日常生活的表象中体现出的现代转型。只不过，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进程所特有的宏大主题，乃至以“革命化”为“现代化”的表现形式的特殊历史路径更加严密地遮

① [英] 戴维·弗里斯比著，卢辉临、周怡、李林艳译：《现代性的碎片》，第73、74页。

② [英] 戴维·弗里斯比著，卢辉临、周怡、李林艳译：《现代性的碎片》，第359页。

③ 参见利奥塔著，车槿山译：《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第5章“社会关系的性质：后现代的视野”，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④ 有关“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的问题，参见吉登斯著，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第7章“生活政治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蔽了它们身后这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如有外国人这样评述中国的革命：“简直梦想不到”，“居然在短短几个月中，会有这么多舞场的设立。凡旅馆，莫不附设舞场、奏舞乐。而一般自称为新的青年男女，都到那里度其新生活……中国真已革命矣，非徒口说而已。”^①

二、“两个翅膀论”与媚俗化问题的引出

范伯群先生在《我心目中的现代文学史框架》中，提出了“知识精英文学与市民大众文学双翼展翅翱翔的‘两个翅膀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②。范先生是研究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大家，他这篇文章所针对的问题是，所谓中国现代文学史，除了包括我们所熟知的诸如鲁迅、启蒙主义、左翼文学、京派等等“知识精英文学”外，还应包括迄今为止仍然处于被相对忽视状态的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杂志和相关的文化现象。范先生的这一观点，以及以他为带头人的学术团队在近现代通俗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无疑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研究的基础。而“两个翅膀论”本身也启发了我对更为丰富的历史原生态的探询。不过，如果从以上我所论述的现代性的两个层面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史长期存在的“单翅现象”，则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在这里是被理解为那种总体性的现代性的。范先生尽管提出了“两个翅膀论”，但是他显然并不认为“两个翅膀”之所以成立乃是因为存在着现代性的两个层面。相反，他说“我认为这些通俗作家是为‘五四’作过隐性准备的”、“文学的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通俗作家也作过或多或少的贡献”、“通俗作家也有许多庸俗文字……应该去除和剥离”^③，也就是说通俗文学其实和新文学一样，都是为“（总体性）现代化”服务的，而且为了通俗文学能够登堂入室，还需将“许多庸俗文字”“去除和剥离”。所以如果用总体性现代性的标准来衡量，通俗文学尽管数量庞大，但是“沙里淘金”之后，这“两个翅膀”也难免一大一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海外学者为代表，提出了一条新的文学史线索，“颠覆‘五四’和左翼叙事，建构日常生活叙事”^④，将晚清狭邪小说等通俗作品、新感觉派、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作家作品纳入这一线索中，以颓废或审美现代性的多重话语空间来反抗启蒙现代性与左翼文

① 《盛京时报》1928年9月4日，转引自博玫：《〈紫罗兰〉（1925—1930）的“时尚叙事”》，复旦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页。

② 参见范伯群：《我心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框架》，载《深圳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③ 同上。

④ 参见郑闯琦：《从夏志清到李欧梵和王德威——一条八十年代以来影响深远的文学史叙事线索》，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1期。

学的单一狭隘。这一研究方法和思路对本书有着直接的启发和影响，它更加明确了一种不同于“大历史”的“小历史”的存在及其价值和意义，在现代性的两个层面上有了更加明确的表达。然而所谓“颓废”，所谓“被压抑的现代性”看似远离民族国家层面、而偏重于都市或乡村的日常生活叙述，但是在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入研读后，我仍然有着这样的感觉：由于他们意在发掘这些作品中对都市现代文明或乡村传统的自觉反思，以人性、欲望代替启蒙和革命，从而使得这一“日常生活叙事”仍然被纳入有关现代性终极目标的总体性叙事中；也即仍然用言说大历史的方法来言说小历史，而并非用小历史自身的逻辑来言说。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努力已为目下多种主要现代文学史吸收、整合，如其中影响最大的代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换言之，碎片式的现代性，或者说日常生活本身是表象的、自发的、低俗的，非总体性的，但是如果作家将它本体化、本质化而予以价值的自觉提升，评论家以类似的方式对作品进行了阐释，则意味着将那些本来的碎片进行了有意义的连接，将一种平面化的状态演绎成了深度结构，故仍然是对某种现代性总体目标的言说。

我们只有将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不仅理解为包括了审美与启蒙、革命与欲望这样终极目标价值的总体性现代性，而且将其理解为“诉诸感官”的、无意识的、零碎的、平面化的非总体性现代性，“两个翅膀论”才能真正成立。这要求我们暂时摈弃如陈子平所批评过的寻找文学作品的“思想”、“社会”、“风俗”等方面的价值，并进行比较和判断，然后沿着“寻找——肯定——提升”的路向完成等级秩序的重新排列这样一种叙述方式，不再“沙里淘金”，不再剥离所谓“通俗”中的“庸俗”，而是按照“沙”本身的内部特点来言说“所有的沙”，来言说大量一般性的，“没什么意思”的文学。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须避免将现代性的两个层面看成目标价值上的“二元对立”关系，围绕着一个总体性的目标争论着，也许彼此之间会达成妥协（如所谓的雅俗融合，或革命与欲望间彼此的隐性肯定）。它们之间的关系乃是真正的平行关系，是不同的意识所连接的不同世界，它们“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从而形成了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关系^①。这正好像洋泾浜和欧化的语体文、玩台基的女工与秋瑾，尽管存在某些相似性，却完全代表了不同的视野、世界，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也不可能彼此争论、相互替换；但它们又共同结合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体现出现代性的复调。

在进行了以上铺垫后，现在应该引出“媚俗化”的问题了。“媚俗化”正是现代性的非总体性层面在文学艺术上的表现，或者说，正是媚俗化，而不是其

^① 参见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等译：《诗学与访谈》，4~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他，代表了文学艺术上现代性的非总体性层面，从而与鲁迅、茅盾，乃至沈从文、钱钟书、新感觉派等等严肃文学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个翅膀”。也许人们要问，为什么不是通俗？为什么不是日常生活成为其代表？我会回答这一问题。不过首先不妨看看“媚俗”究竟是什么。我们经常用这个词来表示一种坏趣味，一种对“低级要求”的迎合。而新时期以来成长的有思想的青年们又多半是从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认识媚俗的。这里的媚俗似乎更有了一种政治与人性上的“屈从”的含义。这样的理解并不错，但还不够。因为从学术视角来看，媚俗是一个有所指的特定制度。

所谓媚俗，源于德文中的 kitsch，其本义是指一种廉价、低劣的艺术品，比如各个旅游点随处可见的假古董等。其近义词包括低劣、平庸、陈腐、浮华等等。“在各种现代语言用于指称艺术坏趣味的诸多术语中，媚俗是惟一取得真正国际性地位的”；一般地说，它大致有这样的特征：“肤浅”、“相对便宜”、“从美学上讲……可以被看成废物或垃圾。”^① 然而，法国学者波德里亚声称：“媚俗是一个文化范畴。”^② 这句话的含义何在呢？如果仅从内容上看，一幅 50 块钱的可以挂在墙上的仿制世界名画和真正的无价之宝之间、一篇煽情的伤感故事和伟大的悲剧之间可能存在着惊人的一致。然而前者的大量复制、作为廉价商品销售的存在方式以及接受者的消费行为所共同构造的文化世界，显然与后者的世界大相径庭。我们甚至不能说前一个世界是后一个世界的附庸，尽管仿制品是由原作衍生的。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媚俗成为了“一个文化范畴”，被视为现代性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媚俗艺术（它对时尚的依赖和迅速过时使得它成为可消费‘艺术’的主要形式）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可以把媚俗艺术在‘第二’或‘第三’世界的出现看成‘现代化’的准确无误的标志。”^③ 关于媚俗艺术的产生，“决不是美学现代性出现的直接后果”，而“是另一种现代性侵入艺术领域的结果，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技术与商业利润”，乃至到了今天，“已成了一种常规地、无可逃避地包围着我们的艺术。”^④ 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以上对媚俗文化的一切贬称，甚至将其排斥于美学（审美）现代性之外，并不意味着它在美学上的简单和一目了然。从总体上看，以我们通常的经验，可以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所谓媚俗文化，那就是“五花八门”，“中产阶级

① [美] 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 232、234 页，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

② [法] 波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第 114 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③ [美] 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 225 ~ 226 页。

④ [美] 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 14 ~ 15 页。